

與生育資本協商：臺灣男同志尋求跨國代孕的多層次階層化生育

Bargaining With Reproductive Capital:

Multilayered Stratified Reproduction in the Case of Taiwanese Gay Men Seeking
Transnational Surrogacy

Jung Chen

Published in 2025

(中文摘譯：吳青軒 2025/06/04)

摘要

近年來，生育社會研究領域的學者開始關注蓬勃發展的跨國生育產業。在男同志透過卵子捐贈與代理孕母成為父親的案例中，存在著可近性不均與權力落差的問題，特別是處於相對優勢地位的意圖成為父親的男同志，與提供生育勞動的經濟條件較差女性之間的不平等。儘管台灣是亞洲第一個合法化同性婚姻的國家，LGBTQ+群體的生育權益仍然受到限制，迫使有生育意圖的同志家長須前往海外尋求協助生育。本研究以 53 位尋求跨國代理孕母的台灣男同志為訪談對象，從 Bourdieu 的理論視角出發，探討他們如何在性、國籍、種族與社會法律限制的交織脈絡中，透過經濟、社會、文化與象徵資本的協商，來實現其生育目標。面對多層次的階層化生育，本研究發現不平等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：(1) 異性戀者與 LGBTQ+ 群體之間；(2) 同志父親之間的階層差異；(3) 同志父親與代理孕母之間的結構不對等。本文藉由提出「生育資本」(reproductive capital) 這一概念，豐富我們對於階層化生育、跨國代理孕母制度以及酷兒生育正義的理解，並指出同志父親如何策略地累積與動員這些資本，因應跨國生育過程中錯綜複雜的階層化結構。

關鍵詞：Bourdieu、資本理論、同志父親、酷兒生育正義、生育資本、階層化生育、跨國代理孕母

1、前言

儘管臺灣已將同性婚姻合法化，同性伴侶的生育權仍未受到保障。對臺灣男同志伴侶而言，唯一可行的生育路徑是跨國尋求代理孕母。這篇文章以臺灣男同志為例，說明在全球不均等的生育地景中，臺灣男同志所遭逢的階層化生育現象。借助 Bourdieu 的理論基礎，我提出「生育資本」的概念，分析男同志

如何運用不同形式的資源，來實現其生育目標。同時，我也關注男同志如何策略性地與異性戀規範協商（bargain），以爭取必要的資源與支持來建構跨國的父職之路。我將指出：酷兒生育／生育的過程是多層次且階層化的，涉及不同位置的行動者之間的權力關係。這樣的分析，有助於理解跨國第三方生育實踐的不平等面向。

2、文獻回顧

階層化生育的概念關注生育過程中交織的不平等關係，這有助於理解酷兒生育正義議題中的多方行動者所共構的權力網絡。本文採用此種交織性方法，聚焦於臺灣男同志的複雜位置：一方面作為國內缺乏法律支持的性少數，另一方面作為臺灣中產階級，卻難以負擔如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跨國代理孕母費用。此外，我也進一步探討臺灣男同志與美國代理孕母之間的分層關係，後者在收入、美國公民身份以及西方文化與語言優勢上，並不一定處於弱勢地位。為了辨識跨國生育照護中的多層次階層化生育，我採用場域理論來理解同志男性在「生育場域」中的能動性。在這樣的場域中，權力不斷被動員與競爭，藉以確立生育實踐的正當性；性別、性、性傾向、階級與種族的生育階層，便是在各行動者與資本競逐中浮現。於此，我重新檢視階層化生育的概念，並將其與 Bourdieu 的資本理論結合，目的在於深化對個體作為「生育行動者」如何進行協商，並運用各種形式的資本，不僅追求生育，更是建構並正當化酷兒家庭。

受醫療社會學中 Bourdieu 取徑研究的啟發，本文在探討男同志的跨國生育經驗時，特別關注行動者如何主動與其擁有的資源進行「協商」與動員，以追求生育目標——亦即生育資本。聚焦於（準）同志父親，我檢視他們與其他行動者的互動關係，並分析其生育決策如何形塑和主流化「赴美生育路徑」。

3、研究方法

本文旨在探討臺灣男同志在追求跨國協助生育過程中，透過卵子捐贈與代理孕母所做出的生育選擇與生育歷程。實證資料來自研究者於 2021 至 2023 年間，透過實地與線上參與觀察，加入台灣一個 LGBTQ+ 家庭非營利組織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的活動。研究參與者的招募方式多元，包括：透過與 LGBTQ+

家庭組織的實地田野接觸中，接觸同志父親與準父親、在特定線上平台張貼招募訊息，以及透過研究者個人社群網絡擴散。

深入訪談於 2021 至 2022 年間進行，對象包含已成為同志父親者（共 21 人）與尚在跨國生育照護過程中的準父親（共 32 人）。後者的生育歷程包括選擇卵子捐贈者、等待代理孕母人選、等待懷孕進行，以及前往目的國迎接新生兒。在 53 位受訪男同志中，大多數選擇前往美國進行代理孕母程序（共 40 人），另有少數選擇泰國（3 人）與俄羅斯（1 人），其餘 9 人則尚未決定目的地。所有受訪者皆具有大學學歷，其中 6 人接受過醫學訓練、3 人擁有博士學位，另有 8 人具碩士以上學位。他們全部自我認定為台灣的中產階級或中上階級。除了一位全職在家的父親，其餘皆受雇於科技、金融、教育、學術與醫療領域。所有受訪者皆在訪談前簽署研究同意書。此研究計畫已通過劍橋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核。

4、 研究發現

在全球不均等的生育地景中，臺灣男同志遭逢三個層次的階層化生育現象：第一個層次的階層化生育，是囿於法律限制，迫使有意生養的同志赴海外尋求可行的生育管道。第二個層次的階層化生育，轉向同志父親內部的差異性，指出因為社經地位和可動用資源的差異，使得他們可選擇的生育管道形成階層化的現象。第三個層次的階層化生育，則是準家長與孕產勞動者（代孕者）之間的差異——臺灣男同志與美國代理孕母之間的關係，不只準家長們影響對生育倫理的看法，臺美之間反向的生育移動軌跡（從非西方到西方），以及臺灣和美國收入水平和文化差異，也間接影響準家長如何衡量自己與代孕者之間的相對位置。

5、 結論

酷兒動員生育資本，策略性地挑戰異性戀主導的生育系統；同志父親之間的資本組合差異，左右他們可選擇的生育管道；最後，向美國靠攏以取得象徵資本，加強同志家庭生育的正當性，也間接排除不具足夠資本的行動者。這些資本相互增強、積累的生育實踐過程，建構出一種新的生育常規——「同性常規

性」(homonormativity)——此一趨勢表現為：酷兒家庭傾向重視生物血緣連結、接受以醫療科技介入的跨國生育方式(CBRC)，認可以西方(尤其是美國)為中心的「倫理代理孕母」論述，並且向西方文化與白人特權靠攏。也就是說：男同志透過生育資本的累積與動員所進行的協商與決策，既是受到現有結構的塑造，同時也反過來形構該結構，最終促成一套以美國為主的主導性生育路徑的誕生。這種生育資本的持續積累，既有助於動搖異性戀主導的生育假設，同時也再生產出跨國第三方生育場域中，各類行動者之間新興的階層差異。

總結來說，本文拓展對酷兒生育與跨國第三方生育的研究，提出生育資本作為分析視角，幫助我們理解跨國第三方生育中動態且複雜的互動關係，以及該過程中多層次生育階層的持續建構與重組。最後，本文所提出的「生育資本」概念，也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在當今全球醫療化生育快速擴張的時代，我們所需追求的(酷兒)生育正義應該是什麼樣貌。